



## 斑駁的時代光影 ——論蕭遙天與馬華文學史

### 一、南來文人蕭遙天

馬華文學跟中國文學的關係千絲萬縷，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南來文人在馬來亞旅遊或居留期間所寫的現代散文，開創了馬華現代文學史的初章，馬一中兩國的文學關係是流動的，南來文人可能成為馬華作家（如陳鍊青 1907-1943），某些土生土長的馬華作家最終也可能進入中國文學史（如杜運燮 1918-2003）。從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年間的南來作者，可確認身分的有一百五十九人<sup>1</sup>；到了一九五〇

---

<sup>1</sup> 詳見郭惠芬：《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廈門：廈門大學，1999年），頁12。郭的統計有誤，杜運燮出身於馬來亞霹靂州實兆遠（Setiawan），並非南來文人。馬華作家進入中國文學史的作家，除了杜運燮，還有出生於新加坡蔡厝港的蕭村（1930-）。

年代，另有一批從香港南來的作家群，他們在中國出生，在香港開始寫作，南來馬來亞時，也把香港經驗一併帶入馬華文學，蕭遙天（1913-1990）即是一例。蕭遙天，原名蕭建忠<sup>2</sup>，在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他離開故鄉潮陽的妻小獨自到了香港，在這裡很快的有了情感的皈依，育有一子。三年之後南下，於一九五三年到檳城，並任教於鍾靈中學，並且再次結婚生子，成為落地生根的南來文人。他在馬來（西）亞居住四十七年，一九九〇年逝世，埋骨於檳城，一個「長年如夏，氣候單調，生育多且情慾放縱，因熱而人民大多懶惰的南方溽熱之地」<sup>3</sup>。

蕭遙天的潮陽籍同鄉好友鐵抗（本名鄭卓群，1914-1942）南來的年代，馬華文壇是南來文人的天下。蕭遙天抵馬時，馬來亞文壇已經歷「馬華文藝的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爭洗禮。一九四八年四月論爭結束後，英殖民政府在同年六月頒佈緊急法令，試圖削弱漸成氣候的馬來亞共產黨。緊急法令之後，新村成立，華人被送

---

<sup>2</sup> 蕭遙天是最常用的筆名，也最具代表性，其他偶然使用的筆名難考，他主編《教與學》月刊時用了不少筆名寫稿，然而無法獲得證實，只能存疑。跟他一起編《教與學》月刊的麥秀曾提到：「蕭遙天原名蕭建忠，又名永儀，字公畏，以筆名行，很多以為他叫公畏。」（見麥秀：〈蕭遙天的趣事〉，《馬華作家》第11期（2000/06），頁2。）蕭遙天的學生方美富在最新的論述中指出「遙天」也是他的「字」，其弟建孝的字叫「雲天」。見方美富：〈「我的藝友與文友」：蕭遙天與台港友朋交遊考〉，收入張曉威、張錦忠編：《華語語系與南洋書寫：台灣與星馬華文文學及文化論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18），頁180。

<sup>3</sup> 蕭遙天：〈馬來亞的天氣〉，《食風樓隨筆》（吉隆坡：蕉風，1957），頁5-13。

入新村集中管理，被懷疑援共的華人則被英殖民政府遣送回中國<sup>4</sup>。緊急法令對新馬文壇的另一重要影響是禁止輸入中國出版品，於是中國文學對新馬的入口貿易轉而由台港文學取代<sup>5</sup>。香港不止是那時代文人的中途站，或南（東南亞）來，或北（中國）往，同時也是華人世界重要的出版中心和文化中心。對於曾在香港短期居留，又於此取道南下的蕭遙天而言，把香港經驗帶入馬華文學，是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

蕭遙天抵達馬來亞兩年後，《蕉風》（1955）創刊，他在這本南來文人辦的雜誌寫稿，結集成《食風樓隨筆》（1957/04）<sup>6</sup>。出版後四

---

<sup>4</sup> 相關研究見何國忠：《馬來西亞華人：身分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2年），頁38-40。這一波的遣返名單亦包括杜運燮（吳進），《熱帶風光》（1951）即在香港出版。

<sup>5</sup> 方修把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分成三期，第三期即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影響力大為減低，詳見方修：〈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新馬文學史論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書屋，1970），頁38-43。趙戎也指出，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之後，書籍被禁止入口，馬華文藝的本土性意識轉強。見趙戎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散文卷導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頁1。方修指出現象，卻沒有進一步解釋原因為何；趙戎則沒有說明中國出版品被禁之後，馬華文學是否有不同的文學場域進駐。潘碧華〈取經的故事〉一文指出，中國文學的影響力變弱之後，台港文學進場，對新馬文學產生具體的影響。該文收入潘碧華：《馬華文學的時代記憶》（吉隆坡：馬大中文系出版社，2009），頁135-147；後出的論文可參考蘇燕婷：〈1950年代香港南來作家構築的文學面貌〉，收入伍燕翎主編：《西方圖像：馬來（西）亞英殖民地時期文史論述》（吉隆坡：新紀元學院，2011），頁61-81。

<sup>6</sup> 在《食風樓隨筆》之前，他曾在香港出版《夜鶯曲》（1953）、《玩刀子的女人》

個月，馬來亞獨立。雖然如此，他的作品並沒有收入趙戎所主編的《新馬華文文學大系》（1971）。蕭遙天的個案讓我們看到同為英殖民地的香港跟馬來亞之間的文學因緣，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南來文人」一詞的多元意涵，南來文人身分如何跟馬來亞（文學史）產生對話與頡頏。本論文將從香港南來文人的角度切入，論述蕭遙天散文的三鄉視野及其散文特色。

## 二、香港南來作家與馬華文學

馬華文學史的開頭是南來文人，討論馬華文學史的寫作，必然觸及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和角力。方修對這段歷史的描述如下：

中國作者的南來，有好幾個年份是特別大批的。第一批是在一九二七年北伐失敗，寧漢分裂，國民黨在中國各地進行「清黨」、妄殺無辜的時候。當時很多知識份子紛紛從廈門、汕頭、海南島各地南來，形成一陣移民的大浪潮。第二批是在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戰爆發到一九四二年新馬淪陷的時候。多數是從華中、華南各淪陷區避難而來的。第三批是在日本投降後以至中國發生內戰的時候。當時有的是由印度、緬甸、安南、暹羅各戰區復員來馬，有的是因內戰關係亡命海外，

---

（1953）、《東西談》（1954）等三書，後來又在檳城鍾靈中學出版《語文小論》（1955）。

原因比較複雜一點。但大部分在本地居留下來之後，也都為本文藝界所吸收，為馬華文學事業服務。<sup>7</sup>

南來文人跟馬來亞的對話與交流形成馬華文學史前半期的風景，方修這段概略性文字沒有說明的是，其實這三批南來的文人其中有一個群體是從香港南來的作家群和文化人，他們在馬來亞的報館工作，辦雜誌和報紙、編華文教科書，如方修所言「為馬華文學事業服務」，是馬華文學史不可缺席的重要作家。這群南來文人離開中國多半是政治因素，有的固然如方修所言是因為內亂謀生不易，有的則是不認同共產黨或國民黨政權，於是從內地到了香港，又從香港到了新馬一帶。這群文人包括終老於馬來西亞的姚拓（1922-2009），力匡（1927-1991）則居住在新加坡直到逝世；有的短暫逗留之後重返香港，包括《蕉風》編輯群的方天（張海威，1927?-1983?）<sup>8</sup>、黃思騁（1919-1984），黃崖（1932-1992）一九五〇年南來後，到一九八六年離馬赴美。至於楊際光（1925-2001）和白垚（1934-2015）則分別在一九七四和一九八一年離馬定居美國到過世。此外，小說家劉以鬯（1918-2018）也在馬來亞住了五年（1952-1957），而後定居香港，成為香港作家。埋骨於馬來西亞的蕭遙天，正屬於這個時期從香港南來的文人之一，《蕉風》創刊時，邀他寫稿的人正是創刊人余德寬（筆名申青，詳見第二節）。

---

<sup>7</sup> 方修：〈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新馬文學史論集》，頁 43。

<sup>8</sup> 根據馬侖所著《新馬華文作家群像》的資料，方天生卒年是 1919-1983。然而張錦忠有專文指出其生卒年其實難以確認，詳見張錦忠：〈文學史料之窘境——以方天為例〉《南洋商報·商餘》，2015/09/28。

張錦忠〈繼續離散，還是流動：跨國、跨語與馬華（華馬）文學〉認為馬華文學研究側重的往往是中國的南來文人，而忽略了南來並非終點，而是中途。在獨立前，其實南來文人在新馬一帶的流動現象，不論南來北返，或者南來再移居他國，形成跨國的文學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的以下觀點：「過去書寫文學史的人，基於文學意識型態或政治立場不同，往往刻意模糊或略而不提這些（被視為右派的）南來文人」<sup>9</sup>。這群從香港南來的作家群和文化人，正是張文所說的、被現實主義文學視野下刻意模糊或略而不提的右派文人，馬華文學研究最終離不開政治：左派或右派，那才是文學史寫作的根本，誠如黃錦樹〈土與牆：論馬華文學本土論的限度〉所言，馬華文學負載了巨大的民族歷史的包袱，馬華文學的學科研究幾乎可以正名為「文學—政治學」，必須離開文學本身而去關照「馬華文學生產的總體」，所有馬華文學都是「政治—文學」，華人的華文的「文學—政治」，也即是「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的情境<sup>10</sup>。或者在他更早以方北方為個案論述現實主義困境時所言，「馬華現實主本質上是二十世紀亞洲左翼運動在馬來亞華人知識圈中的反應，有它不可諱言的政治背景」、「文學對於那些知識分子而言不過是政治的場域之一，是意識型態的宣傳工具。因而他們預設了現實主義

---

<sup>9</sup> 張錦忠：〈繼續離散，還是流動：跨國、跨語與馬華（華馬）文學〉，收入馬來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主編：《馬華文學與現代性》（台北：秀威，2012），頁142。

<sup>10</sup> 黃錦樹：〈土與牆：論馬華文學本土論的限度〉，《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台北：麥田，2015），頁240-241。

必須、必然對於政治、社會有著巨大的實踐的企圖心，而把文學運動視為社會運動之一環」<sup>11</sup>。方修是最好的個案。他從社會主義式思想建構起來的現實主義，其實取代了他左傾的政治理想，謝詩堅認為他的文學史研究其實是替換，以文學取代政治，免除被解返中國的命運，避開像林清祥那樣，成為政治的犧牲品<sup>12</sup>。

本文上溯方修，為的是說明馬華文學的起源是南來文人，馬華文學史的奠基論述者，也是南來文人；不僅如此，身為南來文人的方修，對同時代的南來文人也有不少散論和「描述」，後出的研究少有略過方修的觀點者。然而，南來文人的意涵並非一成不變，一九四八年的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是對本土性的明確呼喚；接著是關鍵的一九四九年之後，南來文人再難以在馬來亞和中國之間自由來去，因而有以下兩種情況產生：一是南來文人群，然而他們的視野已經跟論爭前的南來文人群頗有差異。另有一個群體，姑且稱之為「北返」或「北歸文人」，有的原是南來文人，有的則在馬來亞出生，一九四九年之後迄馬來亞獨立的近十年間，選擇離開或者被迫離馬。文人的遷移和往返開展了中國和南洋的文化辨證，也開啟了國與家的複雜對話。當然，所謂的文化辨證並非對等關係，更多的是中國文化對南洋的輸出與散播；至於家與國的拉扯，則是後設的觀點。早期的文人對國家與家國之間的分際沒有那麼清楚，國家與家鄉往

---

<sup>11</sup> 黃錦樹：〈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方北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境〉，《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麥田，2012），頁112。

<sup>12</sup> 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檳城：韓江學院，2009），頁221-225。

往對等，因而有離「鄉」背井的形象化表述，鄉者，故鄉之謂，乃是情感所繫之地。至於抽象的國家概念，以馬來亞的情況而論，則是南來文人態度的轉捩點——馬來亞獨立，「南洋」的概念逐漸由「馬來亞」所取代，一個新興的國家成立，僑民與國民的身分差異，遂使僑民意識產生轉化或轉變，而非突如其來的裂變。從僑民意到馬來亞意識之間的過渡，是馬華文學史不能忽略的議題。如果在南洋短期居留的郁達夫、胡愈之，去國文人杜運燮、蕭村等能入馬華文學大系之列，那麼，最後老死於檳城的蕭遙天，沒有缺席的理由。

方修所處的時代語境決定了他的文學視野，而他是馬來亞文壇的重要文史家，他的左翼文學史觀引領時代風潮，排除或刻意忽略了這群香港南來的右派文人。《蕉風》的創辦人申青來馬前在香港編反共刊物《中國學生周報》（1952/07），他先在新加坡創辦《蕉風》（1955/11），後來又把《中國學生周報》的星馬版南移新加坡出版，去掉「中國」兩個字，是為《學生周報》（1956）<sup>13</sup>。《中國學生周報》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的「友聯出版社」（1951/04）出版，當年的創社宗旨即為「反共」。友聯出版社隸屬香港美新處，在香港共有四份刊物，以《中國學生周報》的銷路最好，設定的閱讀對象從台港到東南亞，乃至印度和美國等十餘國的華僑<sup>14</sup>。《學生周報》和《蕉風》的非左

---

<sup>13</sup> 見姚拓〈馬來西亞變成了我的故鄉〉一文，他述及《中國學生周報》幾位香港出生的編輯不願到星馬工作，遂促成了姚拓南來的因緣。此文收入姚拓：《雪泥鴻爪》（吉隆坡：紅蜻蜓，2005），頁562-563。

<sup>14</sup> 參見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52期（2012/12），頁217-242，亦可

派背景，自然不見容於以方修為首的左派，「這兩本姐妹刊物都是由友聯出版社的集團負責出版，被左派統戰認為有台灣，有美國支持的反共背景。其所刊用的內容一般避開現實政治。初時雖不正式標榜反共，但字裡行間全然與當時的大眾化文學走相反的道路，也與澎湃的左翼文學運動產生矛盾和衝突」<sup>15</sup>。這群從香港南來的文人中，姚拓在中國曾經當過國民黨軍人<sup>16</sup>，方天（張海威）的父親張國燾更是被視為叛徒的前中共領導人<sup>17</sup>，他們的背景是這樣的「政治不正確」。馬華文壇在一九四八年方歷經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洗禮，這些影響了《蕉風》的編輯風格，因此創刊號的「馬來亞化」呼籲，表面看起來跟左派的觀點並無二致，其實另有蹊徑，蕭遙天《食風樓隨筆》的馬來亞化取材，亦有其時代意義（見第三節）。

以上所述，主要說明馬華文學的「結構性」問題（黃錦樹用語），文學總是受到政治立場和意識型態等非文學條件的干擾和影響，即便是表面看起來要跟中國意識脫離關係的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骨

---

參考吳兆剛：《五十年代《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研究》（香港：嶺南大學哲學所碩士論文，2007）。

<sup>15</sup> 《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頁 194。

<sup>16</sup> 姚拓當兵的經過，以及跟共軍作戰被俘的事件，參《雪泥鴻爪》第二輯「少年時光」和第三輯「十年槍林彈雨中」。

<sup>17</sup> 相關資料見姚拓：〈馬華文學上的長青樹——《蕉風》〉，《雪泥鴻爪》，頁 570；張錦忠：〈文學史料之窘境——以方天為例〉，《南洋商報·商餘》（2015/09/28）；謝詩堅對《蕉風》如何在馬來亞文壇受到左翼的批判有詳細的論述，詳見《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頁 194-200。

子裡仍然跟中國「左翼革命文學理論」脫離不了關係<sup>18</sup>。然而，即便是被現實主義篩選過的史料，早期的馬華文學的史料保存卻又有賴於方修或「方修們」，被現實主義剪輯過以致失真的文學版圖，不論是第一套或第二套大系，都必須經過後來的研究者角度的調整與還原。重寫文學史，不論是史料的再蒐集或者論述的重建，都是馬華文學研究的迫切工程，發現蕭遙天的意義在這裡。

趙戎編的《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收錄一九四五到一九六五年的新馬文學，蕭遙天沒有人列<sup>19</sup>。本來各家編選選集取捨標準各異，

---

<sup>18</sup> 黃錦樹認為馬華文壇的現實主義基本上是複製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以民族形式和大眾化去架構地域色彩，文學其實是置於政治底下去運作，乃是政治對文學的非自然干擾。相關問題討論見〈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從北方方的文論及馬來亞三部曲論馬華文學的獨特性〉，頁 106-109。

<sup>19</sup> 蕭遙天也未收入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散文史讀本（1957-2007）》（台北：萬卷樓，2007年）。這三冊散文選的選文時間從 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亞聯邦獨立建國開始編起（到此選集 2007 年 9 月出版為止，正好滿五十年），蕭遙天唯一的散文集《食風樓隨筆》在 1957 年 4 月出版，恰好不在入選時間之內，《熱帶散墨》（1979）是舊作重編，不能採計。這是選集在時間跨度上的選擇，並不意味著獨立前的作品都不算馬華文學，更多的考量是獨立前的作品相當零散，不易全面掌握。在即將出版的陳大為、鍾怡雯編《華文文學百年選·馬華卷》（台北：九歌，2019）就收入蕭遙天的散文。對馬華文學而言，國家的概念顯然是個「問題」，無法週全處理馬華文學的流動，包括：南來北返，或者出生於馬來亞而後北返中國（香港）；又或者南來之後定居他鄉的文人；星馬分家之後，定居新加坡的作家；在台入籍台灣的馬華作家。黃錦樹的理想是馬華文學的「文學」應超越「馬華」、國家、國民、民族國家論述、國族寓言，而有無國籍華文文學的觀點（見〈馬華文學的國籍——論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收

收不收入，旁人無從置喙。可是如果沒有明確的編選標準和體例，同時有令人意外的遺珠，便有商榷的空間。尤其一九七〇年代以前，新馬文壇的文學選集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趙戎在散文卷〈導論〉有以下的觀點：「在這個集子裡選錄了三十多位散文家的八十多篇作品。其中很多沒有出過單本行的，由於時間相隔得太久，他們的作品已不容易看到，若不再搜錄起來，恐怕會被湮沒了」<sup>20</sup>。由此可見，早期的馬華文學資料多有散佚，因此，保存史料、為沒有出過個集的作者留下痕跡，是選文的考量之一。但是，這不應該是大系的優先原則。大系具有「歷史」的功能，亦有「定論」的作用，是評價作家和作品的重要指標。

蕭遙天南來之後受邀為《蕉風》寫稿，集結成書時適逢馬來亞獨立，那些書寫熱帶題材的系列散文，應該非常符合當時的政治氛圍和時代氣息。被趙戎誤判為「戰後南來」、「住了一個時期又離開」的吳進，在八十多篇散文中也佔了七篇之多，比例偏高，可見「身分」不是問題。從趙戎的導論來判斷，他並不排斥「僑民意識」，亦頗能接受寫實傳統之外的抒情散文。所以，蕭遙天的例外個案，顯

---

入《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頁 231），陳義甚美，但是文學無國界恐是理想，國家和民族國家的論述一直是馬華文學的困境。

<sup>20</sup>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散文卷導論》，頁 2。另外，馬華作家韓萌（1922-2007）編《南洋散文集·前言》表示，一九二八年馬華文壇出現第一個文藝副刊，歷經二十幾年間只有十部左右印成個集，日本侵馬期間不少書刊付之一炬，資料散失的情況非常嚴重，乃興起編輯這本選集的念頭，參見韓萌編，《南洋散文集·前言》（香港：求實出版社，1952），頁 2。

然無關個人「美學」評價。其次，導論言及一九五七年的《蕉風》辦徵文活動，依此推論，趙戎不太可能忽略了固定給《蕉風》供稿，散文也在蕉風出版社印行的蕭遙天。第三，趙戎並不像理論卷的主編苗秀那樣立場強烈鮮明，不只公然撻伐現代派，要求「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愛國主義」，以及效忠馬來亞等等這些極端「本土」的文學立場<sup>21</sup>。本文完全沒有咎責於趙戎的意思，一如方修，他們受限於時代，有自身的文學信念，雖然那文學信念造成了馬華文學的「實踐困境」。蕭遙天在當時相對重要的選集缺席，正好回應了文學和政治的密切關係。

### 三、「三鄉」對照記：時代之「風」與隱匿的祖國

《食風樓隨筆》原是蕭遙天在《蕉風》寫的專欄結集，書名非常「本土」、非常馬來亞，一個讓新馬讀者會心的熱帶書名<sup>22</sup>。食風一詞出自馬來語（makan angin），新馬華人按照馬來語的字面意義，直接譯成中文和方言，稱之為「吃風」，意指出遊玩樂，可進一步引申為「有錢有閒」：有錢又有閒的富裕之輩，方有出遊玩樂的餘裕。蕭遙天在馬來亞習得這個本土的新詞彙，以之為書名，頗值得玩味。他在序文有以下描述：

---

<sup>21</sup> 苗秀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理論卷·導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頁 1-24。

<sup>22</sup> 《食風樓隨筆》全書作品皆收入《熱帶散墨》（1979）。

這幾天，接到余德寬兄為《蕉風》創刊號徵稿的信，並囑我源源多寫些馬來亞氣息的譬語，竟觸動雅興，我又想從筆尖建築一座馬來亞氣息最濃厚的樓閣來。按這裡的「頭家」們在郊外幽勝處建築的園墅，大家都叫「食風樓」，這回我也來一座「食風樓」罷……遠方讀者，幸勿望文生義，相詫不久以前蟄伏「閣樓」上的傢伙，跑到南洋，淘得金塊，轉眼便是「食風樓」的「頭家」了。<sup>23</sup>

余德寬筆名申青，跟蕭遙天一樣，是南來文人。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到香港，一九五二年香港《中國學生周報》創刊時任社長，一九五四年南來創辦新馬地區的《中國學生周報》，隔年，又再創辦《蕉風》<sup>24</sup>，蕭遙天則是一九五三年到香港，由此推論，余德寬與蕭遙天應是香港時期的舊識，蕭遙天曾在散文〈十日遊程〉（1957）記述兩人和文友的交遊。引文提及邀稿的標準是「馬來亞氣息」，因此這系列散文可供我們檢視文學與時代風潮的關係。此其一。其次，蕭遙天的兩本小說《夜鶯曲》和《玩刀子的女人》均以香港為背景，《食風樓隨筆》雖以馬來亞為主軸，仍有〈香港消夏錄〉，以及把香港經驗嵌入新馬風情的散文，例如〈熱帶女兒〉。引文所謂「閣樓」，指的是在香港時期暫居朋友居處的閣仔賣文為生，稱之為閣樓，苦中作樂也。第三，《食風樓隨筆·敘》刊於創刊號（1955/11），〈馬來亞的天氣〉（1955/12）刊於第二期，內容非常符合邀稿人的要求，這

---

<sup>23</sup> 《食風樓隨筆》，頁3。

<sup>24</sup> 《雪泥鴻爪》，頁570。

時，蕭氏不過南來兩年有餘，竟然很快就捕捉到這「視風如食般重要」的熱帶氣候神髓<sup>25</sup>。

這裡必須對《蕉風》的創刊宗旨略作說明。根據申青多年後的回憶，《蕉風》原名本叫「墾拓」：「《蕉風》在籌備時，本擬名『拓墾』，後經編委們多次反覆斟酌，咸認為這份刊物應強調熱帶地方性的風格，最後定名為《蕉風》」<sup>26</sup>，顯見這份具有熱帶風光的刊物，一開始便以「馬來亞化」為風格，相較於寫實又能代表底層民眾的「拓墾」，「蕉風」的熱帶形象顯得更在在地色彩些。由於《蕉風》提出「馬來亞化」，左翼乃提出「愛國主義文學」口號，方修認為這比「馬華文藝的獨特性」更馬來亞化，也明確標示馬來亞即將建國的事實<sup>27</sup>。蕭遙天回應申青的熱帶地方性風格之作，乃是「食風樓」，用他的話說，乃是「從筆尖建築一座馬來亞氣息最濃厚的樓閣來」。

蕭氏的生命基調乃是中國傳統文人，與蕭氏相熟的文人易君左（1899-1972）稱之為「南天一枝筆」<sup>28</sup>。擅舊體詩、繪畫、書法之

---

<sup>25</sup> 〈食風與沖涼〉，《食風樓隨筆》，頁16。

<sup>26</sup> 申青：〈憶本刊首屆編委〉，《蕉風》第483期（1998/04），頁85。

<sup>27</sup> 林春美：〈非左翼的本邦——《蕉風》及其「馬來亞化」主張〉，《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總94期（2016/03），頁75。此文乃是根據〈獨立前的《蕉風》與馬來亞國族想像〉（2011）修改而成，主要是回應謝詩堅對《蕉風》的右派觀點。相關討論亦可參考賀淑芳：〈《蕉風》的本土認同與家園想像初探（1955-1959）〉，《中山人文學報》35期（2013/07），頁101-125。

<sup>28</sup> 當時香港形同文人的集散地，蕭遙天在香港時期結交了不少文人學者。易君左、饒宗頤均在一九四九年後離開中國，姚拓也在一九五〇年離開家鄉河北到了香港。易君左稱蕭氏「南天一枝筆」普遍為人引用，稱號出處見翠園：〈遙天

外，尚研究姓氏、戲劇、潮州話，修辭學、文字學和訓詁學皆有研究和專著。他主編《教與學》(1961-1972)文藝月刊，培養了不少文壇新筆。除此之外，尚有現代散文(雜文)、小說和新詩近十種<sup>29</sup>。蕭氏古典底子深厚，寫作的靈感來源有時奠基於傳統底子，《食風樓隨筆·敘》對「風」有此一解：「此中秘訣，便是聞風耳食，舉凡古今中外，遠戚近鄰，如有嘉言讜言，盡收筆底，風是文章的餵料，不食無以壯大」<sup>30</sup>，文白相融，雅潔明快，不論古典或白話在他筆下均獲得很好的發揮，亦可從行文之節奏想見其人之颯爽性格。其次，從引文可見其日常生活和學識是寫作的泉源，蕭氏自認是浪漫派，不時褒貶人物時事。此外，在散文中嵌入自製的舊體詩，或引古詩詞名句，甚至文言白話參半，在蕭氏同輩的馬華(本土)作家以及南來文人之中，可謂風格獨具。蕭遙天有舊體詩集《食風樓詩存》，與文友之間亦常以舊體詩酬唱往來，甚至還批評朋友的詩作<sup>31</sup>。

---

一瓣馨香在》，《馬華作家》第11期，頁8。

<sup>29</sup> 蕭遙天著作書目可參考〈蕭遙天全集書目〉，《馬華作家》第11期(2000/06)，頁9。歸入專門研究(戲劇、姓氏、語言文字、民間文化等)者十種，小說五種，散文雜感四種，新詩一種，舊體詩一種。這份名單待查證，其中小說與散文有誤植與闕漏，與本人所蒐集的實體書在書名上頗有出入。馬漢〈蕭遙天與《教與學》〉則有雜文回憶這本歷時十二年的月刊，該文收入馬漢：《笑彈人間——馬漢雜文選集》(台北：釀出版社，2012)，頁264-265。

<sup>30</sup> 《食風樓隨筆》，頁3。

<sup>31</sup> 一九六〇年代，梁園(1939-1973)曾在《光華日報》發表改革舊體詩的文章，引起筆戰。梁園是《教與學》的撰稿人之一，蕭遙天與之熟識，卻冷眼旁觀，不加入筆戰。蕭氏私下對麥秀說，梁園舊詩寫不好，寫此文無說服力(見麥秀：

蕭氏日常交遊的文人學者，除了馬華作家之外，尚有畫家張大千，南來文人徐訐（1908-1980）、新加坡南洋大學講學的潘重規（1907-2003）教授，以及潮州同鄉學者饒宗頤（1917-）等皆與之熟稔。<sup>32</sup>〈檳城山水人物〉記述往來文人雅士，自陳「文化界人士過檳，多有酬酢，港台畫家紛紛來此展覽，不可勝紀，多囑為文評介……星大、南大、馬大的發展，受聘名教授講學之暇，亦相率來此度假」<sup>33</sup>，並提到招待錢穆伉儷，錢穆且讚美檳城的風土人情，尤愛升旗山，後來蕭遙天在升旗山辦檳光學院，乃是受錢穆啟示。證諸他的散文，跟他往來的多為非左翼的文人學者，再加上他固定給《蕉風》供稿，即便沒有鮮明強烈的政治立場，很容易被歸入右派而沒有人選大系。

蕭氏訐直而言，批判時代和風氣，例如「天下滔滔，很多人像牆頭草，隨時而靡，對風氣一味順應；區區竊不敢苟同」<sup>34</sup>；或借朋友之言直指「星馬文人皆品在二等以下，不敢為真理而仗義執言，或望政府顏色；或望惡勢力扮演的群眾顏色，皆無獨立人格」<sup>35</sup>。這些逆耳之言究竟實指為何，二品文人或惡勢力何指，是否跟彼時

---

〈蕭遙天的趣事〉，頁4)。

<sup>32</sup> 徐訐於一九五〇年到香港，一九六〇年到南洋大學教書，六年後再北回。蕭氏在〈馬來亞的天氣〉一文稱他徐訐兄，應是舊識。潘重規教授於一九五七年從國立台灣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到南洋大學；至於潮州同鄉饒宗頤，則於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間任教於新加坡國大，兩人在中國即已相識，並於一九四九年先後抵達香港。

<sup>33</sup> 《熱帶散墨》，頁77。

<sup>34</sup> 《食風樓隨筆》，頁3。

<sup>35</sup> 〈十日遊程〉，《熱帶散墨》，頁99-100。

的馬華文壇風氣有關已難以查證，惟可資我們推測其行事為人。

蕭遙天多次在散文中表示自己賣文為生、鬻字療飢，從不諱言缺錢，可謂快人快語<sup>36</sup>。或許這是他的散文時有倉促而就的痕跡，〈十日遊程〉(1957)自認為塞責之作，「內容絕少異地風光的描寫，僅友朋酬酢的記敘，破爛流水帳已耳。厚顏刊出，目的在以稿費為旅費的挹注，而賣文至出版日記，亦見才窮也」<sup>37</sup>。雖然如此，蕭遙天的散文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馬華文壇，仍是奇葩。即便匆忙而就，或者如他自陳乃是記流手帳，仍然不失水準和趣味，「他寫起文章十分投入，可以把一切俗務都拋開，關起門來，埋頭寫作，天塌下來都不理，而且文思敏捷，倚馬萬言」<sup>38</sup>，這跟他的浪漫派個性有關，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滔滔而就，不隨波逐流，卻也往往跟時代之流不符。

其次，文化中國是蕭氏的精神泉源，根之所繫。對於一個以中文書寫，且植根於古典中國教養的文人，無論如何，他的寫作都無法逃離或迴避文化中國的濡沐。即使他盡可能呼應時代之風書寫馬

---

<sup>36</sup> 跟蕭遙天亦師亦友的翠園指出，蕭遙天教學、印書、編雜誌，除了教書之外，餘皆賠本。後來他在檳城升旗山辦了學院（從蕭氏散文判斷，應是檳光學院無疑），招收泰國華人學生和華族子弟，惜地理位置不佳，辦了兩年而停止。蕭氏在中國有八個兒女需接濟，賣文之餘也賣畫，在新馬等地辦過不少畫展（畫展之事蕭氏錄於散文），他甚至也幫自己在上海美專讀書的老師輩畫家劉海粟賣畫，參見翠園：〈遙天一瓣馨香在〉，頁 6-7。

<sup>37</sup> 〈十日遊程〉，《熱帶散墨》，頁 103。

<sup>38</sup> 〈蕭遙天的趣事〉，頁 3。

來亞，呈現的往往是外來者和本土的角力。因此，他的散文便擺盪在北國與赤道，在文化中國與「感官南國」之間，中間則是他情之所鍾的香港。〈馬來亞的天氣〉有以下的敘述：

我們不僅是一枚寒帶種子，而且是一株上有枝柯，下有根莖的經霜老木，飽歷寒暑，有豐富的時序變換經驗。現在移植於馬來原野，看高椰低蕉，搖擺舒卷，風態自然，我們也要學它的風態自然，尤要習慣此地的土壤氣候才能夠把根莖深種與枝柯橫披。不過，這棵老樹的意識便不會像高椰低蕉那麼簡單了。它有北國的舊憶和南國的新感，它的經驗，耐慣冰雪的冷酷，卻耐不慣人情的冷酷；喜愛人情的熱烈，又頗畏懼赤日炎炎的熱烈。然而它總得像向日葵般很勇敢地去面對那赤炎炎的現實，心裡是既矛盾也醒定的。<sup>39</sup>

引文自陳是來自寒帶的老木，歷經風霜，而終於植根於熱帶，必須努力適應此地的風土氣候。除此之外，尚有人情冷暖必須勇於面對。如此坦率的獨白，道盡南來文人的心理曲折和矛盾，既想融入本土，又無法擺脫舊經驗的禁錮。〈馬來亞的天氣〉刊登在第一期《蕉風》，題目乍看確實很馬來亞，實則非常不本土。一個土生土長的馬來亞人，不需要也不會特別關注已經日常化的天氣，惟有外來者，帶著他者的眼光和雙鄉的視野，才能從平常處看出異常。正如引文所言，他認為自己同時有「北國的舊憶和南國的新感」，這篇近五千字的散文除了題目符合邀稿標準之外，其實是不折不扣的「兩地書」：從外

---

<sup>39</sup> 〈馬來亞的天氣〉，《食風樓隨筆》，頁6。

來者的眼光看馬來亞，從而對比出中國與馬來亞的差異，蕭氏在其散文中更喜歡以香港與馬來亞對比，以北方的香港取代中國。因此，更準確的說法，這是「三鄉」：中國、馬來亞、香港的對照記。

蕭氏甚少提及在祖國的過去，寥寥幾筆帶過，例如〈寂寞的海〉（1953）：「本來我在層岩疊嶂的深山裡是擁有八個孩子的父親，為了掙脫山的禁錮，尋求海的自由，我忍心把他們丟下了」<sup>40</sup>。這段引文幾乎是蕭氏散文中最私人的交待了。中國的家人和鄉土記憶跟他的馬來亞書寫完全不成比例，對於一個流放的寫作者而言並不尋常，從他筆下最常出現「寂寞」和「孤獨」兩個常用詞彙反推，他應有非常濃厚的思鄉之情。何況，他「融入」馬來亞的過程如此漫長，那「對照」式的寫法意味著他仍心懷北國——儘管他的參照對象，都是香港，也往往止於香港，一個只住了三年的地方。三鄉的「中方」代表，是他的中國經驗——蕭遙天的鄉土中國被刻意縮小，甚至隱匿，或者化約成抽象的存在，朦朧的象徵（詳見第三節）。馬來亞則如前面所言，是「感官南國」，也即是引文所謂「土壤氣候」以及「人情冷暖」的所在，一個等待適應和發現的新現實和新環境。至於香港，則是「從前」的代碼。在他的散文裡，不見具體的北國（鄉土中國）現實，與馬來亞對比的往往是香港。他的前半生，就隨著他的南來，消失在「暖風醉人，天氣單調」的熱帶裡。

為什麼北國是禁忌？為什麼蕭遙天對自己作了自我檢查和設限？

---

<sup>40</sup> 《熱帶散墨》，頁 111。

誠如第一節所論，一九五〇年代的馬來亞業已歷經本土文藝論爭，緊接著準備獨立。蕭遙天於一九五三年南來，同是南來文人的姚拓（姚天平）對這個年份有特殊的論述：「一九五三年不單是新馬兩地在政治、經濟上的分水嶺，在文學上也是一個分水嶺。」英軍處理抗日軍不當，失業和通貨膨脹，罷工、示威，以及馬共的對抗行動，加上緊急法令的發佈，一九五三年以前，新馬局勢動盪不安。五三年之後，政局漸趨穩定，經濟好轉。在文學方面，則從僑民文學變成「獨立的馬華文學」，到了一九五六年，新馬文化界發起「愛國主義文學運動」，強調現實主義關注馬來亞之外，尚要求文學必須發揚愛國理念。<sup>41</sup>姚拓所言不假，第二套大系的總序有以下表述：「凡是不以新馬為背景的，一概不收」；「新、馬現在已成立獨立國家，作為這兩個國家在文學方面的代表的這一套書，它之不應該包括僑民作品，那是理所當然的」<sup>42</sup>。在這樣充滿「排外」時代氛圍下，南來的蕭氏處境自然是頗為尷尬，蕭氏對時代風氣之有微言，跟這種氣氛不無關係。一九五〇、六〇年，適逢「本土」高張、「除此（馬）之外，別無其他」的排外時代：「新、馬的華文文學作品，當然追不上中國第一流的文學作品，可是比起中國的一般作品來，

---

<sup>41</sup> 姚天平：〈二十年來的星馬華文文學〉，收入香港中國筆會文選編委會編，《二十年來的中國文學》（香港：香港中國筆會，1979），頁74-76。括弧內為姚之原文，餘為轉述。關於馬華文學的愛國主義運動的討論，詳見苗秀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理論卷》（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頁301-333。

<sup>42</sup> 李廷輝：《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總序》（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頁4-5。

卻是絕對不會相差得太過離譜的。這是一個事實」<sup>43</sup>。這個不見得是事實的「事實」，不過說明「本土」視野的排外和盲點，突顯以「國家」為思考的文學史侷限，以及「國家」的暴力，同時也解釋了蕭遙天《食風樓隨筆》序文對時代之「風」的欲語還休。

其次，進入一九五〇年代，英殖民政府大肆掃蕩親中國的華人，中國跟共產黨劃上等號，南來謀食且有家累的蕭氏或有顧忌。蕭遙天不是個案，同樣在一九五七年離開馬來亞的方天和劉以鬯，他們的小說也都自覺避開禁區，這兩位「馬來亞化」頗為成功南來小說家，在他們筆下典型的熱帶場景完全迴避了跟那時代並存的馬共。方天寫底層勞工的小說背景不是膠林便是礦場，這些都是馬共出沒之處，然而，出於英殖民政府的雷厲風行，他們完全不敢觸及<sup>44</sup>。方天小說《爛泥河的嗚咽》同樣在一九五七年由蕉風出版，他跟蕭遙天對時代的風氣應有同樣的感受。蕭遙天把中國經驗凍結，跟方天把馬共隱形一樣，既是自我檢查和設限，也是自我保護。

《食風樓隨筆》因此可視為時代症狀：一個外來者在適應期所發的熱疹。《食風樓隨筆》（1957）之後二十二年乃有《熱帶散墨》（1979）。蕭氏在這段時間遊遍新馬，那些浮光掠影的遊記，不過進

---

<sup>43</sup>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總序》，頁4。

<sup>44</sup> 詳黃錦樹：〈香港—馬來亞：熱帶華文小說的兩種生成，及一種香港身分〉，《香港文學》總365期（2015/05），頁13。劉以鬯亦可參考朱崇科：〈劉以鬯的南洋敘事〉，《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10期，頁122-130。莊華興：〈劉以鬯的南洋寫作與離散現代性〉，《當今大馬》，〈<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56202>〉，2014/03/06。

一步說明蕭氏「本土化」的斑斑痕跡，充滿本土與南來的交鋒，斑駁的時代光影。

#### 四、北國文人的感官南國

跟大部分的南來文人一樣，蕭遙天關注馬來亞的風土物種，以及民情風俗，毫不例外的寫了榴槤和椰子，也毫不掩飾他對南洋女人的好奇和興趣，率直個性在南來文人和民風保守的馬來亞，可謂異數。女人是蕭遙天散文的重要題材，固然我們可以說這是延續香港時期都市男女情感糾葛的小說主題，亦是浪漫派文人的瀟灑行徑，然而更根本的原因，則是寂寞。蕭氏寫南洋的散文基調多半是歡愉的，卻難掩離鄉背景的落寞，具體的例子在〈過熱帶年〉(1954)：

檳城是好地方，是馬來亞的花園，我住在「甘榜」村落，高椰低蕉，婆娑其下，蒼翠南山，悠然見之。這裡風景的幽美，唯香港的青山與之相彷彿，青山還缺乏一種異國情調。可惜我不是來這兒「食風」的「頭家」，閒情太少了，欣賞的機會也不多；僅叨「空氣感染」而已。我白天要擠入人海揮汗，夜裡仍坐在斗室伏案，工作很忙，內心也很寂寞。<sup>45</sup>

引文可見蕭遙天佳節思鄉的情緒，第一次在馬過年，「一切皆備，只缺了一件，那便是寒流」<sup>46</sup>。如此輕描淡寫，跟他龐大沉重的「寂

---

<sup>45</sup> 《食風樓隨筆》，頁 47。

<sup>46</sup> 《食風樓隨筆》，頁 49。

寞」不成正比。他想念北國的寒冷空氣，南方卻是揮汗吃火鍋，敞開大窗睡覺，惟求枕冷衾寒。蕭遙天把自己譬喻為「老樹」，「老樹的北國舊憶」不能坦白直書，本土題材只能現炒現賣，寫遊記和雜文（如《東西談》，1954），或者處理無關要緊的主題，例如天氣。尤有甚者，迫於生計，他白天教書，晚上伏案寫稿，惟有寂寞與孤獨相伴。蕭氏多次表示有經濟上的壓力，〈寂寞的海〉少見的觸及個人私領域，儘管點到即止：在中國有家室，八個小孩；香港亦有家室，一個小孩。他南下為稻粱謀於相對安定的馬來亞，然而終究難以驅除寂寞和孤獨。他後來在馬來西亞第三次成家，然而馬來西亞的家庭生活竟然完全不見於他後出的散文《熱帶散墨》。

「寂寞」和「孤獨」是他散文的重要主題。〈寂寞的海〉和〈蕉窗小語〉可資證明。他在檳城嘗試追尋情感的寄託，終於失敗，因此轉而旅行全馬自北以南，卻仍然無法逃離寂寞和孤獨的襲擊：

我怕寂寞，嘗試了好幾種反抗的方法而失敗之後，我依然覺得可以親近的仍是寂寞的海。它有星光，有月亮，有濤韻，有船燈的眨眼，我將如何消除寂寞呢，還是常到寂寞的海邊靜靜地安息一番，那倒是我的希冀，但無奈我困惑於番茉莉下細語的女人，丟在孤島天堂的海濱的那枚發芒的白寶石，一群孩子。我需要這一件包含眾體的東西來供晨夕歡娛，我為了工作，似乎應驅除這個奇怪的意念，我的理智未始不知，而終於擺脫不了孤獨給予我的襲迫與困惑。<sup>47</sup>

---

<sup>47</sup> 《熱帶散墨》，頁112。

引文使用不少象徵，細讀全文卻不難理解這段關鍵文字：前三行排鋪寂寞的情緒，後三行是對中國和香港兩個家的牽掛，「丟在孤島天堂的海濱的那枚發芒的白寶石」證諸前後文，是指香港的情人（或妻子），一群孩子是在中國家鄉的八個小孩。寂寞和孤獨驅使他在馬來亞尋找情感的慰藉，所謂「無奈我困惑於番茉莉下細語的女人」似有情感的誘惑，番茉莉者，馬來亞女人的隱喻。他最終也在馬來亞成了家。引文前三行總共出現三次寂寞，最後以孤獨終。〈寂寞的海〉在蕭氏的散文中算是私領域訊息最多的，雖然完全出之以詩化手法，仍然足以勉強拼湊出他的生命輪廓，有助於我們重新理解大時代底下，一個浪漫的南來文人的飄泊生平。

〈寂寞的海〉低靡的調性讓人讀到截然不同的蕭氏，彷彿那些書寫馬來亞的細膩觀察和幽默乃是強顏歡笑。此文不斷重複的寂寞以及孤獨，非常值得玩味。〈寂寞的海〉以這段文字結束全文：「馬來亞人總是熱鬧快樂的，我離開了沙灘，在漸漸迎來的異國人的歡樂笑語中，閉下了好寂寞難熬的眼」<sup>48</sup>。熱鬧快樂對比寂寞孤獨，斯人獨憔悴，更根本的原因，是情感上沒有寄託。處處無家處處也可成家，他到了馬來亞，也嘗試欣賞馬來亞的蕉風椰雨，接受南洋生活，努力融入本土：

擬了幾次草稿，馬來亞那銀灰而暗綠的雨景仍無法抒寫，我嘆了一聲，打開蕉窗，悵然望著遠處。<sup>49</sup>

---

<sup>48</sup> 《熱帶散墨》，頁 113。

<sup>49</sup> 《熱帶散墨》，頁 114。

假如時間容許，我將於天雨時節，張帳幕於田野，飾鷺羽，圍草裙，做短時間的野人；興來時，陪著迷人的蠻婆，於滴瀝聲中燒烤鹿肉，建立熱帶女人的藝術習尚。

但這憧憬不也太可憐麼？生活的鞭策早已抹去我享樂的靜閒，我雖然知道馬來亞雨景的可愛，而終不能嘗一嘗她的滋味。<sup>50</sup>

第一段引文可見南來文人對本土的適應過程，〈蕉窗小語〉文後註明寫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初來乍到，面對新環境而難以融入，想寫本土而未逮，乃有第三段「終不能嘗一嘗她的滋味」廢然而止的無力感。雖然如此，他卻也用了「蕉窗」的意象捕捉熱帶的表象。至於飾鷺羽，圍草裙或在雨中燒烤鹿肉，乃是以想像去彌補對現實經驗的缺乏。這篇散文的風格跟他在《食風樓隨筆》寫的那些具體的馬來風光頗有差距。蠻婆者，番女也，中原人士對南方女人的用詞，文明與野蠻的對比。蕭氏不一定對具有男性沙文主義，只是故作輕快狀，實則如散文的小標所言，他乃是在「銀灰暗綠的雨景」的低迷心情中努力本土化，正如〈慵懶的秋雨〉所言：「一邊受新雨的支配，一邊又用舊雨的感情來支配新雨」<sup>51</sup>，在新（現在）舊（過去）擺盪，也在現實和記憶中迷惑。

〈寂寞的海〉（1953/09/02）、〈蕉窗小語〉（1953/09/08）和〈慵懶的秋雨〉（1954/09/18）三篇是在一年之內寫成，其中〈慵懶的秋雨〉

---

<sup>50</sup> 《熱帶散墨》，頁 114-115。

<sup>51</sup> 《熱帶散墨》，頁 121。

已逐漸能夠帶著欣賞的眼光來看馬來亞，謂熱帶的雨「充滿快樂的意緒」，沒有溫帶的感傷和寒帶的淒厲。到了〈夜〉（1955/01/04）竟然表示馬來亞因白天熱，夜顯得格外可愛。這時，他已經在檳城住了兩年餘。這系列散文讓我們看到南來文人和本土的對話進程。

蕭遙天留下的二十六篇散文中，〈寂寞的海〉（1953）、〈蕉窗小語〉（1953）、〈慵懶的秋雨〉（1954）、〈雨〉（1953）、〈夜〉（1955）、〈夢〉（無寫作年份）六篇的調性屬於他說的「浪漫派」，其中〈寂寞的海〉和〈蕉窗小語〉沒有收入《食風樓隨筆》。這六篇屬於「詩化散文」，跟其他記實、符合「馬來亞氣息」的散文風格迥異，詩化散文可以避開現實，方便把北國之思藏在象徵裡。按照寫作時間，〈寂寞的海〉和〈蕉窗小語〉理應收入《食風樓隨筆》。推論蕭氏應是認定這些家國之思的散文調性不符馬來亞即將獨立的時代風氣。時過境遷，時代之「風」不同，這兩篇充滿家國（中國）之思的散文仍然難以割捨，終究收入《熱帶散墨》。

蕭遙天的馬來亞題材基本調性是歡快的，視角是局外人，一切事物都顯得新奇。〈椰與榴槿〉（1954）是一篇贊詞，語調高昂、情緒熱烈。南來文人中，如他嗜食榴槿者少之又少，而能讚賞榴槿外形壯美，且喻之為「大器晚成」的喬木則更是異數。蕭氏且認為榴槿象徵華僑從拓荒到繁榮的歷史，至於最具熱帶風情的植物莫過於瀟灑又高傲的椰樹，不枝不蔓，是熱帶風光的代表。一九五六年，在馬生活了三年之後，蕭氏寫下〈胡姬〉（Orchid，即蘭花）和〈曇花與瓊花〉。敘事風格在古典和熱帶之間穿梭，知識和情感兼具，他結交培育胡姬的閩人，敘述培育過程，同時深入新馬百姓尋常生活，

彷彿已頗能適應熱帶生活。

〈食風與沖涼〉透過食風與沖涼寫自身對熱帶生活的適應過程，「風」跟「水」都跟土地相關，學會「食風」，適應「沖涼」，乃能融入本土。兩者都跟感官和肉身有關，印證早期南下討生活的先民如何以智慧適應異地生活，應對赤道的炎熱氣候。蕭遙天認為沖涼有如「熱帶洗禮」，要能領略晨起沖涼、時時沖涼的好處，才能融入本土：

但沖涼是熱帶生活的需要，新客尤其需要……而且要當天發亮，晨風有點寒意的時候便開始沖。要用浴巾摩擦得熱煙自肌理裊裊而起，要沖得感覺到有一股熱氣自頂溜下，沿背沿腿，以至溜於地，如是暑氣才完全沖散，心肺俱爽，如是你已接受熱帶洗禮，深切地領略熱帶生活了。<sup>52</sup>

跟時代之風唱不同調的蕭氏，這段引文倒深得沖涼神髓，相當寫實，本地作家不見得能抒寫如此細膩描寫沖涼的感受。剛到熱帶的北方文人，最先感受到的是終年如夏炎熱高溫的天氣，最先要適應的是肉身和感官。引文是經由「差異」對比而得的感受，從前沒有而現在有，於是衝擊特別強烈，寫來也格外入裡。蕭氏回憶童年時見到南洋歸僑風光返鄉，因而有以下的了然於心：「我老早已和熱帶的風水種下因緣，終於投入這熱帶土地的懷抱，親受食風沖涼的甘苦」<sup>53</sup>，由此可見蕭氏南來，有遙遠的歷史因緣。〈食風與沖涼〉是一篇非常

---

<sup>52</sup> 《食風樓隨筆》，頁 21。

<sup>53</sup> 《食風樓隨筆》，頁 17。

生活化的散文，他使用不少「在地」語言，如爛賭、威風、沙爹、頭家等，展示本土化的努力，是一個外來者在適應過程中，以他者的眼光「發現」了「土本」忽視的特色。

蕭氏雖有不少學術論著，他的生命基調仍是文人，感情豐富，對於多情文人而言，風景再好人情再美，也無助減輕內心的寂寞。南來之後又再成家，經濟重擔讓他愈加需要感情的安慰和出口，寫作是可能的出口，女人也是。因此，他愛寫女人。

〈熱帶女兒〉(1956)是長篇散文，寫得情思飛揚，從香港女人一直寫到馬來亞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佳麗，援引古詩也用熱帶譬喻，把馬來、印度、白種女人以及娘惹，分別跟椰油味、牛油味和豬油味相聯繫，甚至對不同籍貫、不同工作的華人女性有著深淺不一的分析和評價，又把怡保的美女比之於蘇州。此時他放下感傷的情緒，離開香港時期小說寫女人的世紀末情調，為馬來亞的女性留下時代印記，儘管這些印記帶著非常主觀的個人偏好。他沒有跟著時代的潮流歌頌勞動女性，而是從審美的角度去品頭論足：

我暫且放下勞工神聖的歌頌，單從審美的觀點來看看熱帶的婦女。凡女人都是愛美的，在馬來亞，她們的美感表現，粗看好像走著兩條相背的道路。若干妖姬型的太太小姐，竟效好萊塢的奇裝異服，以粉妝玉琢的打扮與肉體的袒露來向異性作色情挑逗，那些有肉體美而無靈魂美的女郎是可鄙的。但我們得承認，妖姬們穿著臨風招展的短褲，故意透露短褲的一角，那春光洩露是美的；穿著緊窄的薄紗衫，誇張地表現那蛇樣的腰與大哺乳動物的乳房，那曲線也是美的；袒胸

露臂，甚至只遮私處的泳裝，那炫示賀爾蒙豐富也是美的。我們須認識這種美，才瞭解女工們的滿身包紮，是珍惜肉體的舉動，是一種愛美的勇敢。<sup>54</sup>

這段熱帶女人的觀察非常赤裸，毫不掩飾的欣賞異鄉女人的風情和肉體，已不同於初到馬來亞所寫的〈蕉窗小語〉，對熱帶女人只能跟著北國人稱「蠻婆」，而無實事描寫。這時「迷人的蠻婆」得到具體的素描，他完全可以欣賞這種純肉體的、無關靈魂道德的美感，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歌頌勞動女性的偉大和崇高，而是寫她們的肉體美，完全不同於左派的敘事。即便寫「三水婆」的膠工、礦工、泥水工，著墨的亦是她們的衣著打扮，姿態神采，無關勞動的神聖，可謂非常「政治不正確」。蕭氏欣賞馬來女子和印度女子的「異國情調」，卻無法忍受她們的文化和風俗。他對娘惹尤無佳評，稱她們面敷白粉（應為水粉）是為「惡心的習慣」<sup>55</sup>，難以接受她們嚼檳榔吃咖哩，其他的例如：「只受洋文教育，華文一字不識」、「生活中不中不西，崇拜現實，崇拜金錢，夢中所追求的是電影上英俊風流的白種人」<sup>56</sup>，則有失偏頗和公平。雖然如此，這些初步的觀察和印象，充滿南來和本土的交鋒。〈熱帶女兒〉是馬華散文史中少見的品評女人之作，既感官又寫實，側寫時代女性，深得熱帶風韻。

蕭遙天提供了迥異於前期南來文人不同的視野，雜糅了南來、

---

<sup>54</sup> 《食風樓隨筆》，頁 17。

<sup>55</sup> 《食風樓隨筆》，頁 21。

<sup>56</sup> 《食風樓隨筆》，頁 22。

本土與香港的生命體驗。他以北國之眼寫南國的天氣和人事風俗，以及花草景物。只要跳脫寂寞的感傷眼光，蕭氏得自於美術專業的寫實性觀察功力，素描和細描的敏銳細膩筆法，加上三鄉視野，往往能夠寫出獨具一格的馬來亞社會。由於時代的「風氣」使然，中國經驗跟共產黨一樣成了時代禁忌，必需被擱置，存而不論，因此故鄉在他筆下只能是個人收藏的記憶，無法形諸文字，香港成了中國的替代物。蕭遙天散文的自我檢查現象，說明了馬華文學跟政治的密切關係。

由於三地皆有「家」，他對出生的中國、過客的香港以及終老的馬來亞皆有感情。傳統中國文人的教養以及浪漫的文人性情，使得他的散文呈現多元而異質的特色，跟當時以寫實為主流的時代之風產生對比／對話。他把香港經驗帶入馬華文學史，使得南來文人的內涵更豐富多變，同時也突顯「馬華文藝獨特性」的文學史暴力。

蕭氏散文留下「在地化」的斑斑痕跡，充滿本土與南來的交鋒，斑駁的時代光影。其實，不論《食風樓隨筆》或《熱帶散墨》，書名都非常政治正確，北國和新客多元視野下的馬來亞題材，跟單純的本土視野可以相互頡頏和對話。儘管《食風樓隨筆》出版時正值馬來亞獨立，他的右派文人形象和風格，卻讓他在當時以左翼為主流的馬華文學史中缺席。